

【日】陈舜臣
中国的历史

著

郑民钦译

中国的历史

解读历史，每个人或者说每个层面的人
都有自己的视角。

——陈舜臣

第一卷：
从神话到历史
中华的摇篮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日】陈舜臣

著

郑民钦译

从神话到历史
中华的摇篮

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

第一卷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历史·第1卷 /（日）陈舜臣著；郑民钦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12
（陈舜臣作品系列）

ISBN 978-7-211-06299-7

I．①中… II．①陈… ②郑… III．①中国历史—普及读物 IV．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903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3-2010-021号

Copyright © 1990 by CHIN SHUN SHIN

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

中国的历史（第1卷）

作者：（日）陈舜臣

译者：郑民钦

责任编辑：潘静超 林 顶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76号 邮政编码：350001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0

字 数：230千字

版 次：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6299-7

定 价：39.80元

译序

这几年，陈舜臣先生在我国声名鹊起，他的著作，主要是推理小说、历史小说、随笔被大量译介，使得我国读者比较全面地接触、了解这位著名的华裔日本作家的作品。平心而论，陈舜臣的作品走进我国读者的视野来得晚了点。他在日本可以说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文学大师，他以推理小说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一部《花叶死亡之日》（《枯草の根》）荣获江户川乱步奖，奠定了在日本文坛上的推理小说家的地位。1967年开始创作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先后有《鸦片战争》、《小说十八史略》、《甲午战争》、《秘本三国志》、《太平天国》、《耶律楚材》、《秦始皇》、《郑成功》、《成吉思汗》、《诸葛孔明》、《曹操》等名作问世。他的历史小说具有独特的风格，有意识地将推理手法运用其中，历史与推理的紧密结合更增加了可读性和情趣性，这在日本小说界独树一帜，使他成为与司马辽太郎并驾齐驱的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以日本历史为素材，陈舜臣则以中国历史为题材，许许多多的日本人正是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中国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架起了一座桥梁。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几乎在我国都已出版，唯有篇幅最长的、非小说的《中国的历史》尚未译介，此次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以飨读者，实乃幸事。

陈舜臣的《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中国通史，以时间为轴，自神话时代写到近代。他与史学家的写史方法有所不同，以影响时代进程的事件

或人物为中心展开。

《中国的历史》是史书，不是小说，结构严谨，没有虚构、戏说的成分。他的历史小说尽管也是以史实为基础，但既然是小说，其细节描写难免有虚构的成分，这是本书与历史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所以本书没有太多的细节描写，想象合理，推理合乎逻辑，是史实的努力再现。

陈舜臣是日籍华人，使得他具有与国内学者、作家不同的认知，但更多地站在中国人的视角看待历史，同时也参考一些日本史料进行论证，比较客观公正。他对待历史的态度，正如他在回答《东方早报》书面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观”，“尊重史料和史实是我一贯的原则。我始终认为作家必须尊重历史，但允许作者去想象。”

正因为如此，他对史料采取中立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弊病，他所讲述的事件都有史可查，绝不杜撰，但又不盲信史料，往往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载、论述，经过条分缕析，得出自己的历史判断，在不少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提出独到的观点。例如写三国的曹操、刘备，唐朝的李世民，南宋的贾似道，甲午战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摆脱历史观的惯势影响，较少局限，克服感情上的碰撞与矛盾，根据史料尽可能地去展现当时的真实历史。

他没有以史学家自称，的确他不是史学家，他是作家，所以他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的时候，没有那种常见的显示着权威性的、甚至强加于人的面孔，而是一种温和的姿态。对他的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的见解，这也期待着读者的见智见仁的探讨。

尽管不是小说，但严肃的史书同样离不开立足于史实的推理，这种推理其实就是一种严肃的考证行为。他说：“我依照自己的方法来理解这些相同的基本史料，并且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解释、推理。”他的推理十分审慎，对隐藏于表象后面的真相的想象尽量做到合情合理，期待对历史真实的还原。

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只有一个真相。但这不影响对史实进行不同的观察和评判，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历史的主观意识也会发生变化，每个人解读历史的权利都不应该被剥夺，每个人都具有对历史

的话语权。

陈舜臣作为作家写作的史书，没有学者式的枯燥，讲述历史事件，语言平实无华，通俗易懂，严谨缜密，把握分寸，雅俗共赏，又不失艺术性，写得风生水起，生动活泼。语言的平实，不等于肤浅，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在他的几乎没有任何装饰性、极致到平淡凝练的对文字具有超强驾驭力的笔下，呈现出时代发展趋势的长河奔腾，脉络清晰，可以比较完整地宏观地把握历史变迁的全貌，同时在细节上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这就避免了把鲜活的历史变得干巴巴的纪年表。

《中国的历史》自然是以日本读者为对象，但也适合我国读者。原因有两点：一点是作者具有独自的历史观，其学术性不亚于史学家的正论；另一点是以作家的笔触撰写史书，具有更大的可读性。而且作者的目光经常关注基本被正史所忽视的底层民众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作用，对民众创造历史文化、推动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给予应有的客观的评价，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以独自的文字表现其历史观，为体现原貌，我在翻译时尽量体现作品的原有风格，保留作者的用语，语言力求规范平实。

陈舜臣的创作极其重视史实，视史实为生命。今天翻译这部出版于1990年的《中国的历史》，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未能利用其后我国的考古发现以及研究成果，不然，很多问题的论述将更加明确，也必将大大丰富充实本书的内容。例如，本书对良渚文化的阐述比较简略，如果利用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也许会对中国的朝代断代产生新的想法。再如本书谈到北匈奴的呼衍王，只说到班超的幼子班勇于“永建元年，在平定车师国之后，一鼓作气趁势击败北匈奴的呼衍王”。如果作者能看到在东天山北麓发现的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东黑沟遗址，从其中出土的《镇海碑》的“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这段话，对呼衍王的结局就有明确的结论。当然，我这样的遗憾是一种难以避免的，不应该是对作者的苛求，这也正是说明历史不断需要改正、更新的必要。

透过《中国的历史》，可以感觉到作者积淀数十年的对传统史学的深厚功底，处处闪烁着敏锐智慧的光芒，透彻深邃的洞察力和恢宏辽阔的大视野把读者带进中国历史气势磅礴的时代进程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无比深远的情韵。因此，他的史书具有普及性的意义，读者可以从这部书中明确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中的定位，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获得诸多思想的警示，对构建政治文明的未来社会具有精神的启迪。

陈舜臣文学已经超越国界，走向世界，对异质文化的包容使他超越民族、宗教、语言、风俗、意识形态等障壁，在国际文化的大视野中审视、考察中国历史。他说：“希望通过写作更多地跨越国界去思考，很多事情应该朝着无国界的方向去融合。”我认为，这就是陈舜臣文学创作思想的终极目的。

郑民钦

自序

这是一部中国通史，讲述的是从上古时期到民国之间数千年的历史。这部作品的写作时间是从1980年到1983年，在这期间，我还写了一部关于中国历史的作品《小说十八史略》。相对于《小说十八史略》断代史般的简明风格，《中国的历史》则更加全面和完善，篇章之间也更有传承，从叙事的节奏和角度来说，《中国的历史》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对我而言，从事写作要么是历史小说的角度，要么是历史记述的角度，这两种写作方式，伴随我一生。可以说，相较于《小说十八史略》的文学化、通俗化体裁，《中国的历史》是从历史记述的角度来写作的。这是我规模最大的一部作品，包括了我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代表了我个人的历史观。

《中国的历史》这部作品，还有一个特殊的含义，就是它涵盖了我对华人世界读者的感情。我从事写作以来，从未间断过对中国历史的探索，但多数都是以单个事件或者人物为载体。这部作品则超越了以往诸多作品的界限，从而给予中国的历史一个全方位的解读。我想，在当初创作此书之际，我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希望给广大的华人世界读者传播尽量多的中国文化，让他们能够从多个角度去认识多彩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

我还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向中国历史界的学者致敬。中国的历史学家注重感觉，偏重于借古喻今，他们的创作更多着眼现代性。而我的创作，虽然尽量起用一种“中国式”的思维，但究之根本，却还是从日本读者

的角度去阐述历史，它代表了我个人的历史判断，也代表了日本普通读者对历史的一种认知。我的叙事角度可能和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有所不同，但它却为中国历史的叙述提供了另外一条伸展的道路，这条可能性道路正逐渐明朗，从而给予我的历史写作一种十分难得的体验。对此我深感欣慰。

在日本，很多读者都是通过我的文字才了解到一水之隔的中国以及她深沉悠远的历史，所以我希望能够借助这样一部作品，给他们带来客观和全面的中国历史。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本能。我也希望这部作品能给中国的读者带来全新的历史文化体验，我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像我这样的作者关心着中国历史，并试图让这片土地曾经发生的故事传播到五湖四海。

这是本书首次在中国大陆翻译并得以出版。多年前，我的挚友冯牧先生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版本的出版寄予厚望。多年后的今天，此书中文版终于如冯牧先生所愿，得以出版。于我而言，这既是好消息，更是给冯牧先生的最好告慰。

当《中国的历史》即将付梓之际，我要感谢此书的出版方——福建人民出版社，以及译者郑民钦先生。出版社和译者的地域背景对我而言，又有一层特别的意义：我的祖籍是福建泉州，而译者也是福州人，所以这部作品能够在我祖籍所在地出版，真是一件非常让人欣慰的事情。

陈舜臣

2013年9月

目 录

从神话到历史

- ◆ 三皇五帝 〇〇二
- ◆ 王朝的发端 〇四〇
- ◆ 巨大的落日 一〇六

中华的摇篮

- ◆ 落日余晖 一五〇
- ◆ 郑声靡音 一七四
- ◆ 开疆辟土 二〇二
- ◆ 九合诸侯 二一六
- ◆ 五霸交替 二三五
- ◆ 孔子时代 二六八
- ◆ 南风骤起 二九二

年表



从
神
话
到
历
史





三皇五帝

我曾经一边行走在旧金山中华街的坡道上，一边思考：刚才所听到的故事将如何在那个社会传播呢？那样的故事会传播下去吗？更重要的是，那个社会会一直存在下去吗？

这是一位第二代华裔老人对我讲述的故事：关于他的父亲随祖父移居美国的经过。他的故乡广东省花县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出生地，因此居住在叛逆者首领之地的居民都受到清朝廷严厉的镇压。由于无法忍受这种压迫，人们便开始出国谋生。

这位老人的儿子、四十多岁的第三代华人对这个故事似乎还有些兴趣，但当时也在场的下一代的青少年，据我观察，对祖父讲述的故事却毫不关心。他们大概连“太平天国”的基本知识都没有。

不言而喻，对于已经成为美国国民的年轻华人来说，华盛顿、林肯的故事比太平天国更感觉亲切。即使他们还记得曾经听说过的太平天国的故事，但对其发生的年代以及重要人物等，恐怕都记忆模糊了吧。尽管他们家族中的近祖和这一起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的重大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他们心中，太平天国仍然是遥远时代的遥远世界里的事情，对其记忆无疑会越来越淡薄，很快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美国修建横穿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的时候，移居美国的中国人急剧增加。因为美国人认识到，作为这项前所未有的艰巨工程的建设者，中国人比当时美国所能招募到的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华人



劳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美籍华人社会中，这种记忆极其鲜明深刻。

当年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华工的后裔，其中的成功者所集结的同乡、亲属的后裔，在美籍华人中大概占相当大的部分。他们传递给子孙后代的故事中，讲述修建横穿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的叙事诗要比太平天国战争的残余片断更加生动，更有激情。因为这些故事就发生在他们现在所居住的美国这块土地上。

后来，中国的留学生来到美国，也有的定居下来。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他们也会给后代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美籍华人中，有几位学者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些光辉耀眼的天才是华人社会的骄傲，他们的故事大概也会久远地流传下去。

不管什么行业，成功者的背后总有失败者。失败者的故事作为警戒后人的教材也会流传下去，但往往会被抽象化为“懈怠懒惰、干坏事的人就是这样的结果”，而失去其固有的姓名。也有的失败者的名字被人长久记住，那他一定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经历的人物。

美国的华人社会的历史，充其量不过百余年。但历史毕竟是历史。正因为历史短暂，当被记忆的时候，就能看见所谓历史的原型。

某个行业中的华人后裔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强势的华人后裔，引起他们强烈关注的那些事情就成为主要的记录对象。有权记录并保存历史的是多数派或者胜利者。少数派或者失败者的历史很少被记录下来，或者不能正确地得以记录。人们思考历史的时候，对于那些缺少记录或记录不实的历史，必须采取寻找、挖掘史实的态度。

在记录手段十分发达的今天，即使是少数派，只要愿意，就可以强行留下自己的历史记录。除了文字，还可以利用录音或者影像。但如果无视保存，那只会埋没历史，最终无异于没有记录。然而，后代的人只要想发掘，就有可能发现其痕迹。

几百年后，还有谁能挖掘出那位旧金山的第二代华裔老人所讲述的故事呢？

一般地说，神话是远离神话生存时代之后的记录。

记录是一种整理，所以在整理的过程中无论如何都会变形。我们首先必须考虑为什么有必要记录神话及其时代背景，尤其是政治形势。

例如《古事记》^①、《日本书纪》^②中记录的日本神话，据说就是为了阐述皇室以及国家的起源所构成的。津田左右吉将其断定为完成于8世纪初的“虚构的神话”，在战前引起争论，他也被驱逐出大学校门。记录的时期就是认为有必要阐述国家起源的时代。

因为神话的构成具有明确的目的，其体系自然保持首尾相当的一致性。被记录下来以后，虽然政权所在地变来变去，但总是皇室圈内的事情，无须对阐述建国的神话加以修改。从地区上说，也没有同时存在第二个、第三个政权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中国的神话缺少首尾的一贯性，同类的神话多有重复，有的不过是片断的拼接。中国的神话缺少完整的体系。

中国地域辽阔，早年曾经政权并立，大概都有各自的建国神话吧。但是，这些地方政权盛衰兴亡反复无常，神话也随之消失遗忘。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消失的那部分，有的就可能留存下来。

神话具有反映历史的一面，但绝非全面反映，是所谓的片断性反映。神话是在某种意图的支配下虚构出来的，所以从神话中寻觅历史可以说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与之相比，考古学上的发现则是极其具体的历史本身的痕迹。然而，痕迹终归是痕迹，以此重构全部历史绝非易事。

尽管是虚构的神话，但产生虚构的必要性这个事实本身会成为解读历史的重要钥匙。例如，日本的神话被记录下来，应该是在国家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相当稳固，并觉得必须予以加强的时代。当时已经进入8世纪，所以神话虚构工作具有很高的组织性。

中国的神话不是日本式的国家神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国家神话。如上所述，国家神话应该是非常之多，而国家神话与这个国家的

① 《古事记》：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史书，共三卷，712年成书。作者太安万侣。——译注

② 《日本书纪》：日本最早的敕撰史书。模仿中国的《汉书》、《后汉书》形式，三十卷，720年成书。舍人亲王等撰写，以汉文、编年体方式记述日本神代至持统天皇的历史。——译注



命运休戚与共。

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是在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后，神话已经被吸收进诸子百家的著作里。他们的著作是阐述自己的思想，并展示说服力，并非以论述国家起源为目的。中国的神话中，国家神话的色彩很淡薄。诸子百家的著作文字平铺直叙，其中所引用的神话往往失去生气。已经“化石化”的评论未必夸大其词。

同样是使用神话，《楚辞》等文学作品中引用的神话故事至今依然鲜活生动。

神话不等于历史。

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都认为始于三皇五帝，但司马迁的《史记》起始于《五帝本纪》。他舍去了三皇，大概因为他不认为三皇是史实。

所谓五帝，即黄帝、帝颛顼、帝喾、尧、舜。司马迁从黄帝开始论述，但在《五帝本纪》的结尾这样写道：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甚至在公元前2世纪司马迁那个时代，有地位、有学问的人都不谈黄帝。有关黄帝的著述非常之多，其中过于荒唐无稽之事也非常多，不能将其全部视为史实。

令人注意的是，司马迁没有盲目附和当时知识分子的态度而轻视黄帝。他写道：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

《五帝德》是《孔子家语》中的一篇，《帝系姓》是《大戴礼》中的一篇，其中都记述有黄帝之事，但当时的儒家学者不认为二者为正



统的经典，未加以传播研究。

然而，司马迁明确指出，像《春秋》、《国语》这样最正统的经典著作中也引用或参考上述两篇的记述，批判儒家学者之所以漠视《五帝德》、《帝系姓》这两篇文章，是因为他们缺少深入思考的缘故。如果深入思考的话，大概就会发现其中的内容未必全部虚构。司马迁相信这一点，他以这样两句话作为《五帝本纪》的结束语：

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尽管荒唐无稽的记述很多，但经过严格的筛选，将那些认为稳妥可靠的内容置于《史记》卷首。

司马迁将黄帝置于神话和历史之间，大概是想赋予历史的“半市民权”吧。

从黄帝这个名字来看，具有浓厚的五行说的味道。认为古代史上实有黄帝其人大概比认为神武天皇是真实人物的人要少。黄帝只是传说中的人物，但其中包含着不止一个古代帝王的影子。大概司马迁从这个意义上赋予黄帝历史世界的半市民权吧。即使神武天皇并非真实人物，大和王朝的祖先里也存在过含带有神武天皇影子的人物，这一点总不能否定吧。

五帝之后，是夏、殷两代王朝。史书上如此记述，但先前也有人认为这两代王朝也是神话。

司马迁在《史记》中列出殷王朝的帝王家谱，但人们大抵视之为神话时代的虚构。即使认为殷王朝的存在是历史事实的人，也不曾相信司马迁所写的殷王朝帝王家谱。但是，1899年以后，随着占卜用甲骨文的出土，以及后来的殷墟发掘，《史记》中所记述的殷王朝各个国王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得以证实。

进入20世纪以后，殷王朝才从神话跨入历史。

日本曾有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被称为“抹杀博士”的学者，中国也有此类学者，称为“疑古派”。从做学问这一点来说，可以予以肯定。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甚至也不相信黄帝实有其人，但是他认为关于黄帝的传说并非完全虚构，而将其置于《史记》的卷首。从司马迁不盲从的态度看，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疑古派。

五帝之前的三皇，司马迁也不认为是历史人物，在《史记》中避而不谈。现在的《史记》记述始于《三皇本纪》，但这并非司马迁所撰，而是唐朝司马贞的补笔。司马贞尽管和司马迁有同姓之缘，但这个补充显得多余。

司马贞将庖羲、女娲、神农定为三皇，并介绍另有一说指天皇、地皇、人皇。庖羲大概就是伏羲，但三皇还有其他说法，有的以祝融或者燧人甚至黄帝代替女娲。说法如此之多，这也是神话时代的特点。

人们习惯于说三皇五帝，我认为还是出于时间的顺序。大概司马迁认为五帝比三皇更接近历史。然而，我怀疑那些所谓古代的诸神其实都是新神。

大家十分熟悉的诸神已经密密麻麻地充斥于那个时代，根本没有新神的插足之地。即使硬塞进去，也会发现原来是另类，被孤立起来。于是没有办法，只好把新神安插在不太为人所知的更加久远的古代。反正那是正如《古事记》所说的“成群海蜃轻轻漂游”的混沌初开的时代，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地让其混进更加久远的古代。

将新神安放在久远的古代里，疑古派的顾颉刚（1893—1980年）主张称为“加上说”。日本江户时代的富永仲基（1715—1746年）也创立同样的学说。

不仅新神，其他地方的诸神也在寻求插足之地。那些非主流的诸神往往在久远的古代获得了立足之地。

五帝和三皇，与其说是新旧区别，我以为不如说是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别。

三皇中的神农，在日本的知名度最高。正如其名，神农是农业之神，据说发明了农具铁锄、锄头，并将使用方法教给大家。他还尝百草，寻觅医药，所以也是医药之神。司马贞说，神农还制造五弦瑟，教人们进